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底在聽取行政長官李家超述職時，對特區政府提出「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的明確要求。筆者認為，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還須以宏觀視角，立足長遠進行配合。2023年6月，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對當下時代背景作出了重要概括，提出了「兩個大局」加速演進並深度互動的重大命題。香港必須在把握歷史大勢中找準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戰略定位，胸懷「兩個大局」，社會各界團結一心，自覺把行政主導維護好、落實好，讓「一國兩制」、「愛國者治港」和香港的良政善治得到更有力和有效的推進，續寫香江傳奇新篇章。

姚柏良 立法會議員

所謂「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個大局」為我們更加精準把握行政主導的歷史方位、面臨的時代主題提供了分析框架。

面對百年變局的波瀾雲詭，香港是牽引「兩個大局」深度互動的關鍵支點。香港回歸祖國20多年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其根本原因之一在於堅守以憲法和基本法為基礎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而行政主導體制正是這一憲制秩序的核心特徵。從「兩個大局」的角度看行政主導，既符合歷史邏輯，也符合實踐邏輯，有利於深入領會行政主導的核心目標。

更好把握行政主導歷史自信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以及「十五五」時期，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戰略地位仍然不可替代，戰略重點將從發展層面升級至治理層面，戰略作用將更為綜合多元。香港須在現有體制框架內不斷自我革新，最終提升施政與管治效能，更好應對挑戰、搶抓機遇。

這份制度自信，根植於行政主導的制度基石，也是特區政府的使命擔當。筆者近年一直推動香港與內地高鐵「雙向奔赴」，深切感受到高鐵「千里江陵一日還」的便利，感慨8年多前香港社會對於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與否的討論。當年特區政府爭取中央支持，繼而推動本地立法落地，終讓西九龍站成為直通內地百多座城市的樞紐門戶。若當年仍以「兩地兩檢」實行，來往香港的高鐵僅能直達寥寥幾座具備出入境設施的車站，香港高鐵的便利性和經濟價值將大打折扣。從「一地兩檢」突破制度壁壘，到北部都會區規劃擘畫未來，再到宏福苑火災的救災及安置工作得以高效有序開展，以及近期全面推進香港五年規劃編制工作，這些都離不開行政主導下的統籌謀劃、高效執行。

行政立法司法「同唱一台戲」

當然，行政主導還有較大的發揮空間。從「兩個大局」思考，特區政府要強化「當家人」職責，摒棄「小政府、大市場」、「不預預就是好」等過時思維，扛起主體責任，展現主動作為，從「政策承接者」主動邁向「主動承擔者」的戰略支撐。同時，要健全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考慮支持香港金管局、貿發局等機構建立更多以市場化方

式運作的「內聯外通」機制，進一步完善現有兩地企業攜手「走出去」開拓第三市場的機制，助力國家更好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牽引「兩個大局」深度互動。

當前，全球經濟處於韌性、風險與重構相互交織的狀態，國際經貿鬥爭就是重要的表象。對於香港來說，國際格局的戰略性重構帶來的影響已經發生且直接影響普羅大眾，需要以更加強烈的歷史主動和戰略主動精神，積極應對和主動牽引「兩個大局」加速演進並與之深度互動。從「兩個大局」着眼，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要主動識變應變求變，改進管治方式，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同唱一台戲」，形成治理合力，為香港謀發展、為市民謀福祉。立法會須把握「支持」、「配合」、「監督」和「促進」四個關鍵詞，發揮更主動、更積極的作用，匯集民意，支持特區政府暢順施政。

推進民族復興 展現人文情懷

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民族復興偉業，始終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兩個大局」加速演進並深度互動的時代背景下，行政主導的順利運行，離不開全社會的廣泛認同和共同參與，需要堅實的社會基礎與文化支撐。社會各界要培育青年人的家國情懷與社會責任感，愛國愛港力量須不斷壯大團結，支持特區政府聚焦發展、改善民生，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令香港成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增長極。

推動愛國主義教育也是重要一環。筆者一直關注青少年的發展，建議可借助舉辦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等活動的契機，提升青少年家國情懷與擔當意識。我們要鼓勵青年一代將個人發展與國家「十五五」規劃中的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相結合。以綠色能源為例，香港青年人才可以發揮金融、法律及認證服務方面的專長，協助內地綠色企業進行跨境融資、發行綠色債券，或為碳交易市場提供專業的合規與諮詢服務，成為連接內地綠色產業與全球資本的「超級增值人」，把依託國家作為最大底氣，在競爭激烈的全球市場中贏得未來。

世界從來都不是風平浪靜，置身在民族復興偉業的征程中，香港必須把握歷史大勢，找準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戰略定位，胸懷「兩個大局」，社會各界團結一心，自覺把行政主導維護好、落實好，讓「一國兩制」、「愛國者治港」和香港的良政善治得到更有力和有效的推進，續寫香江傳奇新篇章。

促進產業人才升級 繪就香港未來藍圖

蔡冠深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不僅為國家未來的長遠發展描繪了宏偉藍圖，也為香港如何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清晰方向。特區政府正着手編制首份香港五年規劃，這不僅是香港治理能力的一次重要提升，更是香港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的實際行動。

香港五年規劃必須設定可量化、可考核的目標，以及建立跟蹤評估與動態調整機制，同時需深入研究國家發展戰略對香港的新要求與新機遇，並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具體而言應在以下四大範疇作出部署。

第一、隨着內地產業鏈不斷升級，企業「出海」已成為必然趨勢。香港五年規劃應為內地企業提供全鏈條支援作部署。香港可建立「一站式服務平台」，涵蓋市場調研、合規審查、公司註冊及運營等環節，並設立「出海風險預警系統」，幫助企業提前識別風險。香港更要打造「香港服務內地企業出海」的品牌，提升國際市場對「內地企業+香港服務」模式的認知度與信任度，形成示範效應。

第二、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加強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香港五年規劃要深入重點關頭如何加快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吸引龍頭科技企業與研發中心落戶，並推動河套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促進創科要素跨境流動。此外，香港需要將自身發展戰略與國家戰略性新興領域的需求深度融合，聚焦科技前沿，推動相關產業發展。特區政府也要推動金融、法律、知識產權服務，為內地產業升級提供支撐，並助力技術標準走向國際化。

第三、國家「十五五」規劃對加快建設金融強國作出系統性戰略部署，香港五年規劃須進一步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鞏固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地位，推動債券市場發展，並打造區域財富中心。香港還應深化「五大特色金融」——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數字金融、養老與普惠金融，以及伊斯蘭金融，助力國家實現「雙碳」目標，並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提供金融支持。

第四、國家明確支持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五年規劃需聚焦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在就業服務、社保、職業資格等領域的制度對接，完善便利人才往來政策，打通人才流動瓶頸。同時，加強與內地高校合作，引進國際一流學者來港工作，擦亮「留學香港」品牌，建設「國際教育樞紐」，提升香港在全球人才市場的吸引力。

香港五年規劃的制定，是對國家戰略的積極回應，也是香港自身發展的必然選擇。透過精準定位、全面部署和社會共識的凝聚，香港能夠在「十五五」戰略機遇中把握先機，推動高質量發展。

把握「十五五」機遇 推動中國品牌走向世界

邱建新 國際品牌科學院理事長

國家「十五五」規劃是引領全面實踐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藍圖，為香港的發展帶來無限機遇。特區政府也將編制首份香港五年規劃，期待能持續發揮「一國兩制」優勢，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同時，推動中國品牌走向世界。

以品類創新 重塑品牌生命力

國家近年將品牌建設提升到戰略高度，強調傳統產業要強化標準引領，新興產業要注重品牌培育。這標誌着品牌建設已不再是企業單打獨鬥的市場行爲，而是融入國家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重要一環。在這一背景下，一系列前瞻性部署已經展開，其核心思路是通過集聚化、融合化、國際化的發展方向，推動品牌形成「以老帶新、以新促老」的良性生態。對於企業而言，這意味着可以將產品整合、品牌架構梳理、文化融合、產業協同、聯合出海等方向作為內部品牌戰略的落地抓手，借助政策東風，實現從單點突破到系統發力的跨越。

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推動品牌發展的第二個「黃金十年」，必須找準核心發力點。結合當前的政策導向與市場趨勢，未來的品牌建設須着力圍繞以下三大主線。

第一條主線，是從「中國製造」往「中國品牌」進發，構建可量化的品牌價值評價體系。過去十年，中國企業解決了「有沒有」的問題，而未來十年要解決「好不好」以及「值不值」的問題。未來的品牌競爭將是價值創造能力的競爭，企業不僅要關注銷售額，更要關注品牌在消費者心智和認知中的溢價能力、情感連接以及抗風險水平。在存量博弈時代，只有頭部企業和真正具備創新能力的品牌才能生存，前者擁有信賴壁壘，後者擁有心智壁壘。因此，企業需要建立品牌價值監測機制，將溢價能力、心智佔有率、復購率等指標納入經營分析體系，並運用數字化工具對品牌認知度與美譽度進行動態追蹤與優化。

第二條主線，是從「產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建立全球化的品牌資產管理體系。國家「十五五」規劃強調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這為品牌出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企業需要從單純依靠供應鏈優勢的「賣貨」模式，轉向以產品力、品牌力和全球拓展力為核心的「高質量出海」，不僅要布局銷售渠道，更要建立全球化的品牌資產保護體系，在目標市場提前完成商標註冊和域名保護，防範侵權風險；同時建立本地化運營團隊，尊重當地文化習慣，實現從「走出去」到「融進去」的轉變。

第三條主線，是從「價格戰」到「價值戰」，以品類創新重塑品牌生命力。國家「十五五」規劃將科技創新置於核心地位，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對於品牌建設而言，這意味着技術創新必須與品牌創新協同聯動，未來的品牌不再僅僅是商標和廣告語，而是技術實力與人文關懷的綜合

體現。無論是通過開創細分品類解決用戶具體的場景痛點，還是憑藉「質價比」在中高端市場突圍，或是植根於本土文化進行品類創新，都證明了品類創新和功能創新是擺脫內卷式競爭的有效路徑。企業應着力於開創細分品類以建立差異化心智位，圍繞用戶真實痛點進行產品迭代，將技術優勢轉化為可感知的用戶價值，並以「質價比」替代「性價比」，在中高端市場建立價格錨點。

實現品牌與企業戰略一體化

為實現上述目標，企業需要在戰略、技術、文化與生態四個維度建立系統性能力。在戰略維度，品牌戰略必須與企業戰略實現一體化。品牌不應僅被定位為市場部門的職能工作，而應上升為企業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企業需要讓品牌源於戰略並牽引戰略，將品牌戰略納入年度經營計劃與戰略解碼流程，設立由高層直接主導的品牌決策機制，通過品牌價值的提升帶動整個產業鏈的價值升級。

在技術維度，企業需要構建AI驅動的品牌運營體系。AI不僅是一種工具，更是驅動品牌效率革命的引擎。未來企業應利用生成式AI優化產品設計、供應鏈管理和客戶服務，實現精準行銷。具體而言，可以在產品端利用AI加速產品設計與測試週期，在行銷端通過AI生成個性化行銷內容，在服務端部署智能客服與用戶回饋分析系統，在洞察端運用大數據模型發現細分市場。

在文化維度，企業需要深耕文化內涵與情緒價值。隨着Z世代成為全球消費主力，消費需求已從物質滿足轉向精神認同。未來的品牌必須是「生活方式品牌」，輸出審美、態度和價值觀。對於中國品牌而言，這既是機遇也是責任，要善於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通過追趕時代的語言以及覆蓋廣泛的傳播方式，向世界展現中華文化的時代風華。企業可以建立品牌文化資產庫，系統梳理可長期沉澱的品牌故事與視覺符號，圍繞用戶情緒觸點設計品牌體驗，將傳統文化轉化為品牌資產。

在生態維度，企業需要構建協同發展的品牌生態。未來的品牌發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企業協同、產業鏈上下游互補的良性生態，並通過建立聯合實驗室、共享資源、共同參展，形成合力。企業應主動與上下游企業共建創新高平台，參與行業標準制定以搶佔品牌話語權，並聯合跨界品牌或機構共同開展市場活動，擴大影響力。

未來十年將是中國品牌價值深耕、科技驅動、文化引領的十年，必須堅持「向優、向新、向全球」的方向，以更高質量的產品、更具創新的模式、更全球化的視野，推動品牌發展實現質的飛躍，讓更多中國品牌成為世界品牌，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貢獻力量。

對伊戰爭陷泥潭 美國進退失據

沈逸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



美國和以色列以偷襲方式展開對伊朗軍事行動已經持續超過1個月。當地時間4月1日晚，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伊朗局勢發表電視講話，試圖向美國國內與國際社會傳遞兩個信號：其一，美國已經在戰場上接近完成主要目標；其二，美國仍掌握着衝突升級與收束的主動權。按照媒體披露的資訊，特朗普在講話中宣稱伊朗海軍、空軍、導彈與核設施遭到重創，並表示美國將在未來兩到三周內繼續對伊朗施壓，同時要求霍爾木茲海峽恢復開放、自由與安全。

然而，這場講話真正暴露出來的，並非美國戰略能力的從容，而是其在伊朗問題上日益尖銳的目標混亂、成本上升與信譽流失。

美國仍未有終戰方案

美國當前對伊朗政策的核心困境，在於其表面上強調「有限目標」，實際上卻不斷滑向更高烈度、更高投入、更難收束的戰略泥潭。特朗普一方面聲稱美國「很快」可以結束行動，甚至對路透社表示美軍會「很快離開伊朗」，另一方面又威脅如談判失敗將繼續擴大打擊，並且堅持在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上維持高壓姿態。這樣一種自相矛盾的話語結構，說明美國政府至今仍未形成清晰、穩定、可執行的終局方案。

缺乏終局方案，源於戰爭目的漂移。美方最初將行動包裝為「摧毀伊朗核與導彈威脅」，隨後又把海峽通航、地區威懾、伊朗政治變化乃至地區秩序重塑一併納入敘事。目標越來越多，邊界越來越模糊，意味戰爭的「勝利」難以界定。特朗普在講話中聲稱美國「接近實現核心戰略目標」，卻並未給出停火條件、談判路徑與地區安全安排的完整框架。美國媒體明確指出，這場黃金時段講話幾乎沒有提供實質性新資訊，也沒有回答外界最關心的和平路線問題。

美國當前面臨的第二重困境，是衝突成本的持續攀升。在特朗普發出將「強力打擊伊朗並完成任務」的表態後，布倫特原油一度升至每桶106美元以上，美國原油也突破104美元，亞洲主要股市同步下挫。市場對美國無法短期結束行動的擔心，轉化為油價抬升與供應鏈緊張，並迅速向全球運輸、製造與消費領域傳導，也直接反噬美國國內政治。路透社的調查顯示，伴隨油價和汽油價格攀升，美國民意對這場戰爭的支持度持續下滑，特朗普面臨巨大的國內壓力。

美國當下面臨的第三重困境，是同盟體系與地區秩序

工具的透支。特朗普多次催促其他國家幫助恢復霍爾木茲海峽通航，並抱怨盟友支持不足。路透社還提到，特朗普對北約支持程度表示不滿，甚至再次釋放與聯盟關係相關的消極信號。這裏折射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美國雖然仍擁有最強大軍事能力，卻難以將這種能力穩定轉化為可持續的制度領導力、同盟協調力與規則塑造力。霸權如果只能以單邊施壓和臨時脅迫來維繫，必然削弱其制度基礎。

上述三層困境，讓具備歷史洞察能力的觀察者，敏銳地將當前局勢與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聯繫起來。美國歷史學者阿爾弗雷德·麥科伊說，伊朗戰爭可能成為美國的「蘇伊士運河時刻」，將導致美國加速喪失全球信譽和地緣影響力。

手足無措難挽國際信譽

蘇伊士運河危機之所以成為英國霸權衰落的重要標誌，並不只是因為一次軍事行動受挫，更因為它揭示了一個深層事實：舊霸權已經失去按自身意志重塑局勢的能力，尤其是在那些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地緣政治關鍵地區。同時，它也失去了讓盟友、市場與國際社會持續相信其戰略判斷的信譽。今天的美國當然與當年的英國並不完全相同，美國在軍事實力、金融體系、科技能力和聯盟網絡上仍有明顯優勢，但伊朗危機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已經顯示了某些相似之處，軍事打擊可以製造震懾，卻無法自動生成穩定秩序；強制外交可以短期壓制對手，卻難以修復自身信譽赤字。

從後續的發展來看，美國同樣面臨極為顯著的尷尬。其一，若繼續擴大打擊，將無法迫使伊朗在核心議題上實質性讓步，衝突將持續消耗美國的資源、民意與盟友耐心。其二，若倉促抽身，又會在地區留下權力真空與信譽創傷，令美國霸權軟實力進一步受損。其三，若在談判與軍事之間來回擺動，則會讓各方都傾向於採取更高烈度的自保與對沖策略，增加談判概率。

整體而言，所謂美國是否將迎來自己的「蘇伊士運河時刻」，關鍵並不在於某一次打擊是否得手，而在於美國能否證明自己仍然具備以較低代價達成明確政治結果，並維持國際信任的能力。從當前局勢看，特朗普4月1日的講話並未消除這種疑問，反而將之進一步放大了。倘若美國繼續在目標漂移、話語誇張和戰略透支中浪費時間，那麼伊朗問題就很可能成為美國霸權走向實質性衰退的標誌性事件，而美國霸權也將真正迎來自己的「蘇伊士運河時刻」。